

2513

云南省楚雄
彝族自治州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目 录

五百抗日壮士 千古浩气长存

——忆台儿庄战役中的大姚同乡

……………杨中禹供稿 姜泽文整理 (1)

从军抗日琐记……………李毓森供稿 董晓焜整理 (10)

解放前楚雄人民反对贪官林景泰的斗争……………甘振林 (15)

解放初期云龙、三街剿匪纪实……………刘夔庚 (23)

双柏解放初期剿匪斗争……………杨栋才口述 袁忠富整理 (34)

忆朱德芳烈士……………付朝纲 (39)

解放前夕牟定中学革命活动情况……………王尔聪 (42)

一平浪盐场开创史略……………王振华 (45)

回忆我的丈夫李炳阳烈士

……………李奎珍(彝族)口述 李绍光整理 (51)

忆姚安中学师生声援“一二·一”运动……………李祯祥 (56)

楚雄古建筑之一的龙泉书院……………张海平 (59)

省立楚雄中学创立初期概况……………毕希德 (63)

元谋水利建设成就……………管兴邦 (73)

楚雄蚕桑发展简况……………钟家显 (75)

源远流长的双柏妥甸酱油

……………王文俊口述 罗家华整理 (79)

云南名僧修圆大和尚……………何开智 (83)

建国初期的武定师范开办经过……………杨经田 (87)

牟定县人民医院的简要回顾……………黄乐山 (91)

解放前元谋县的司法概略·····	雷树泽(94)
民国时期南华县田赋简介·····	夏大昌(97)
✓天主教传入盐丰概况·····	谢家琳(101)
邓神甫勾结土匪抢劫盐丰城·····	季必善(106)
云南“二·六”政变后元谋遭受的灾难·····	雷树泽(111)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姚安县党部·····	张世功(113)
元谋县朱淮三霸的斑斑罪行·····	仲应先(116)
国民党楚雄县党部成立初期的情况·····	李文藻(120)
积民怨募兵官遭打·····	阮辅臣(123)
解放前后禄丰县黑井戏剧概况·····	杨树清(125)
火把节的习俗·····	段联珍(131)
解放前武定的民间花灯习俗·····	闻从善(134)
县长醉酒 草菅人命·····	永仁县政协供稿(137)
“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发现·····	姜 础(138)
牟定奥秘洞·····	王玉寿(142)

五百抗日壮士 千古浩气长存

——忆台儿庄战役中的大姚同乡

杨中高供稿 姜泽文整理

一九三七年，我在滇黔绥靖公署步兵第七旅十四团第一营当兵。部队驻扎大姚、营长是族兄杨洪元^①（大姚金碧区金家地乡相子坡人）。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部队奉命调往昆明。

蒋介石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浩荡声势压力下，被迫宣布对日作战，并召见龙云，要云南出兵二十万，驰援南京，共挽危局。龙云遂答应先编一个军开赴前线。于是，在九月底按中央军的编制，编成了六十军。六十军由卢汉任军长，下辖三个师，即一八二师、一八三师、一八四师。我们随原部编进了一八四师，一八四师的师长是张冲，族兄杨洪元升任为隶属一八四师第五四三旅的一〇八六团团长，我在该团的一营四连，任中士班长。

一〇八六团里大姚人比较多，而且，有很多还担任着连、排长职务，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起一些人的名字，如杨中良、方贤、赵开禄、金仲刚、马翔、白祥云和戴国斌等，几乎每个排里都有大姚同乡，我们班里就有两人。除一〇八六

团外，一八四师的其它团队和一八二师，一八三师也有不少官兵是大姚同乡。记得在昆明时，我和几个老乡到新任团长的族兄杨洪元处贺喜，他曾和我们谈及此事，他告诉我们，整个六十军的大姚同乡至少不下五百人。他还说：“同乡多好呀，打虎全靠亲兄弟，上阵还须父子兵，同乡多也多个照应嘛！”还有一些同乡是在队伍整编中来投的，他们多数是驻在昆明的其它部队的官兵，听到出师抗战的消息，纷纷跑来，有的甚至是开小差来的，我的一个同乡杨中泮，喝过墨水，肚里有文化，原在补充大队，混得也还不错，要第二批才整编出发。他听说六十军就要开拔，借出差买菜的机会，开小差找到一〇八六团，以同乡同族关系，软磨硬缠着族兄带他到前线打日本。族兄只好收留了他，让他在团部任军需中士。谁料第二天，补充大队探听到杨中泮的去向，到杨团部索要，并说要以逃兵论处，族兄亲自出面“挡驾”说：“哪有往前线逃跑的逃兵？”把来人问得张口结舌，只好作罢。

六十军于九月底全部整编完毕后，十月十八日起，军部和一八三师、一八四师从昆明出发，听说一八二师在曲靖，也同期出发。我们从昆明大东门起程，每人除武器装备外，还有一个米袋，一个背包，一个水壶，每人必须背足一百二十发子弹，班长还有一个防毒面具。服装虽然是整齐的黄军装，鞋子却没有发，由自己打草鞋穿。我们徒步四十余日，经贵阳入湘西，于十一月下旬到长沙。沿途人民积极支援抗战，很多场面令人感慨难忘。

我们在长沙休整几天后，乘火车向南京进发，中途听说南京已陷落，即原连折回南昌，转由南寻路至九江，再由九

江乘轮船到达武汉。几天后，我们一八四师调驻孝感，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进行了约莫三个月时间的就地整训。

大约一九三八年的四月中旬，听说日军的板垣、矶谷两个精锐师团及一部分伪军向鲁南各地进犯，攻势猛烈，前线吃紧，我们接到命令，要转陇海路到归德附近集结待命。一八四师是全军后卫。车到归德，却不准士兵下车，直开除州，转向临、枣、台支线，一直开到车辐山车站。在此期间，我曾经到族兄处打听情况，只见他脸色阴沉，用训斥的口吻说：“问什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训斥过我后，自己却小声骂了两句：“蒋总司令的命令是这样，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又是那样，指挥这样混乱，把军令当儿戏，叫部下咋个打胜仗？”事后我才知道，是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派员拿着他的命令等在归德车站，不准六十军下车，要一直开往鲁南前线，前卫部队已遵令转到鲁南。

在车辐山下车后，按照命令，六十军是战役的 二 线 部队，指定在宋庄一线集结。一八四师是全军的预备队，进入指定地点要晚一些。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听侧面的耿庄、五圣堂、陈家坊一带打得象开了锅一样，不一会儿，作为全军先头部队的一八三师和骑兵部队已往下溃退，形势十分危急。此时，军部已到，卢汉军长一到，即命军部卫队在溃兵后面架起机枪，组成督战队，后退者立毙枪下，溃兵遂返身死战，得以稳住阵脚。一八二师继一八三师之后也投入了战斗，战斗空前惨烈。接火不久，我就从团长那里听到了一些消息：一〇八一团团长沙朔端亲临战阵，身负重伤，营长尹国华阻击坦克，阵亡于五圣堂，以后几天，陆续都有阵亡和受伤的旅、团、营长。也有好消息传来，二十九日夜

间，日军以一个大队的兵力袭击枣庄一八三师一〇八二团阵地，被那里的一营守兵消灭半数，缴获敌人轻重机枪三十余挺，步枪六百多支以及一些重要文件。

六十军作为二线部队，为什么立足未稳，就和敌军接触？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在第一线作战的中央军，汤恩伯的第十九师，听到六十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即向左翼撤走，有的甚至跑到了六十军的后面，让中间空出了一个缺口，日军见有机可乘，即集中兵力，向缺口突入，发现我军后，立即展开攻击，致使立足未稳的六十军蒙受了巨大损失。蒋介石的中央军损人利己，由此可见。

一八四师虽然是军预备队，和日军接触较晚，在战斗中也有一些损失。一天下午，在我们杨团驻守的宋庄阵地前沿出现了敌军坦克。那时麦苗刚没膝，我们趴在麦田里，看着日军坦克耀武扬威地向我们冲来。这样的庞然大物过去别说打，就是见都很少见过。我们投出手榴弹伤不了它，用枪打更没用。子弹碰上钢板不知飞到什么地方，正在危急时候，只见麦地里跳起三个弟兄，他们爬上首先冲过来的坦克，想从射孔把手榴弹塞进坦克，但失败了。狡猾的日寇把坦克一歪，他们三人立足不稳，全掉下坦克，当即被压死，其中有大姚同乡赵开仁，他和我相处很好。坦克大概被弟兄的英勇气概震慑，不敢深入阵地，随即调头逃走。坦克退走后，我找到了赵开仁的遗体，他的下半身被压碎，舌头伸出老长，我和几个弟兄一齐用铁锹挖了一个坑，把他埋在阵地上。

夜里，我们接到了命令，要我们一〇八六团迅速抢占禹王山，阻止敌军渡过运河。在夜色中，我们高步低步地向台儿庄跑步前进。进入台儿庄，台儿庄已是一片废墟，伸脚便可

触到发臭的尸体，景况惨不忍睹。按命令，我们每人拆下一块门、窗板抬上，便向禹王山疾进。禹王山在运河对面，我们来到运河岸，先遣到达的工兵部队已洒水把几棵竹麻索和钢绳横拉在运河上，我们立即铺上我们抬来的木板，跨越运河。

禹王山，矗立在运河边。鲁南的山，较之家乡云南的山，其实只能算一个小土丘，禹王山垂直高度最多不过百把米，全为坚硬的青石头，山如马鞍，一前一后两个山包，靠运河我方一侧的山包稍高，过运河后，我们马不停蹄，直向山顶疾进，刚上山顶，日军已占领前面山包，两方随即开火，双方都想夺下对方所占山包，控制全局。片刻功夫，山包间的垭口里，便死伤累累，血流如渠，我们卧在死人堆里，用尸体作掩体，拼命射击。大姚同乡白祥云排长，身高腿长，向来作战勇敢，他身先士卒，冲越垭口，直捣敌前沿，不幸中弹牺牲，随身士卒也无一幸免，敌人见我方占领了禹王山主峰，炮弹象雨点般地飞来，整个禹王山都被震得颤抖起来。炮火一延伸，步兵立即发起冲锋，在炮火下，我们携带的锹镐无法很快地在石头山上构筑工事，只好用弟兄的尸体和沙包作掩体，伤亡极大。我排排长亦被炮弹炸死，连长指定我代理排长，在枪炮轰鸣中，族兄传下命令，所配属工兵，一定要不惜代价构筑工事，我们抓住战斗间隙，拼命地挖，很多人虎口磨得出了血。到了天亮，我方终于在前沿架设了铁丝网，设上障碍物，并挖出了一些单人散兵坑和机枪掩体。以后，双方又发动了数次冲锋，但各占据一个山头，互相拼命抗争，除增加一些尸体外，始终互相不能越雷池半步，形成了对峙局面。

战斗中，营、团指挥所都已上了禹王山，营指挥所离火

线不过二十来米，族兄的团指挥所就在离营部不远的一个小山洞里。

天亮不久，我检查了各班的机枪掩体后，正想拿出烟枪，吹上几口，一个弟兄跑来告诉我：“团长上来了！”我跟他过去一看，大吃一惊，族兄和另外一个官长在毫无掩蔽的前沿直挺挺地站着，举着望远镜，观察敌人阵地，我连忙立正喊到：“报告团长，危险，快下来！”族兄似乎没有听到我的报告，习惯地从裤袋里掏出一支花旗参嚼了两口，又继续观察敌人阵地。我不顾一切了，跳上去把他拉下来，那个官长见团长被我拉下来，也跟了下来，我们刚在掩体里蹲了下来，连珠般的炮弹就在他们刚才站立的地方爆炸，爆炸的气浪把族兄的帽子吹得老远，大家的身上都溅满了灰尘，若再晚一会，必乘东洋炮弹归西矣。但族兄并不因此而领我的情，相反，训斥了我几句。他走时，要我不顾疲劳，把战壕挖好，做好长久坚持的准备。

血与火的战斗，我们坚持了几天，排里的弟兄只剩下了九人，如果敌人接连冲锋，那真危险之极，我要传令兵赵春龙到团部告急，谁知他才爬出战壕，一颗炮弹便在他身旁爆炸，手足飞出老远。赵春龙和我是同乡，在大姚参军时编入部队，家里老人曾委托我照顾他，不想，反被我误，为这事我内疚了好多天。好在族兄了解前沿处境，中午过后，给我们补充了一部分从金华来的兵员。

最难熬的是天亮前和天黑后两段时间，敌人常常借着黑暗掩护偷袭我方阵地，小股渗透，杀掉我哨兵，摧毁指挥所，每天这个时候，我们使用机枪组成交叉火网，不停息地扫射；此时，日本人的机枪也在疯狂扫射，整个阵地象海啸

一般，尽管如此，战场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难以想象的事情。

一天早上开饭时，柴耀光副营长没有来吃饭，电话也摇不通，我们以为他晚上太劳累睡着了，先后派了同乡周祥熙等三个弟兄去叫，但派去的人也久久不见回来，我又叫几个弟兄一起持枪去叫，刚接近营掩蔽部，突然，里面响起了歪把子机枪声，弟兄在枪声中纷纷倒下，我才知道是日本鬼子摸进来了，连忙命令弟兄卧倒，并和团部联系，集中六门八二炮和六〇炮一阵猛轰，打塌了掩蔽部，过去一瞧，才知道是三个鬼子在拂晓前摸进了营掩蔽部，杀死了柴副营长，披上了柴副营长的大衣，夹断了电话线，杀死了我们去叫柴副营长的弟兄。以后，我们更加加紧了防范，并且组织战士，也摸鬼子哨兵。

我们在禹王山坚守了二十多天。在这二十多天中，敌人向我军阵地发射了上万发炮弹，组织了数十次冲锋和偷袭，使我们亦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就是这样以血肉之躯和敌人坦克、大炮相拼搏，坚守阵地，很多连几乎全部伤亡，很多同乡长眠在禹王山上。幸存的弟兄倦伏在战壕里，头发逾寸，伸手就可抓下虱子。在我们顽强地阻击下，由临（城）枣（庄）南下之敌，前后一个多月，始终无法前进一步，只得改变了策略，破坏我后方交通。他们派遣机动部队，破坏了黄口铁桥，截断了鲁南战场我后方补给线，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见前方几十万军队的粮弹无法供给，遂下令鲁南前线各部南撤。

五月十六日晚，奉上级命令全军撤出阵地。在夜幕和烟雾弹的掩护下，我们才撤离了禹王山。至大八户李庄时，全军集结进行了缩编，将一八二师和一八三师各编为一个团，

一八四师缩编为三个团，仍由曾泽生、杨洪元、邱秉常分任团长。杨团番号仍为一〇八六团。

撤退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特别是中央军，更为狼狈，他们采取化整为零，不分日夜地往后退，到处丢弃着机械通讯器材和背包，一片混乱，我们六十军，官兵绝大多数都是云南人，人地不熟，只利集中，不利分散。我们每人除带上武器、五十发子弹、干粮和一条军毯外，官兵一律轻装，分成前进纵队、中央纵队和后卫纵队三路，先沿津浦南路行至夹沟，再转西南，取道永城和蒙城之间，到达涡阳，又转北行，至亳州西入河南。

在此期间，弟兄们由于长期作战，得不到休整，睡眠不足，精力消耗过大。撤退中，稍一歇脚，便会进入睡眠状态，我们是先行部队，为了不使其它部队冲散我们的队伍，族兄命令我们成三路纵队，两边的弟兄上起刺刀，若有硬冲队伍者，绝不客气，我们撤退的路线，虽然是敌人包围空隙比较大、兵力比较弱的地方，但仍经常受到敌军飞机的轰炸、扫射。部队到达黄口，又遭到日寇阻击，以我们疲惫之师对付眼前的强敌，形势险恶。族兄召集各营长商议，命令组织敢死队开路，由二营营长王明庚为敢死队长，挑选一百六十名壮士，配备精良武器冲锋，一人发一个指南针，各自为战，冲散后，到约定的集合地点集合。王明庚营长一挥大刀，大声喊道：“杨团的弟兄们，冲啊！”顿时，枪声、杀声震耳，仅十几分钟，就撕开了缺口，使全军突出了包围。敢死队中，大姚同乡不少，我亦参加了敢死队，很多同乡在冲锋中饮弹而亡，到浏阳休整时，族兄杨洪元提起此一壮举时，犹热泪满腮，把酒遥祭。

突围中，由于供给断绝，弟兄们大半时间空着肚子行军，路上碰到一口井或一塘水，则拿着水壶，以水充饥，亦有挤进水塘溺死者，一些塘水中，初喝时因为饥饿不觉得有什么味道，以后饱嗝中才觉出牛马屎味。虽然生活艰苦，随时还有死亡危险，但是，为了尽快转移到新的阵地作战，官兵们强忍着饥饿疲劳，经过几日的顽强奋战，上下团结一致，终于到达指定聚集地带，此后，很多大姚同乡又参加了鄂东、赣北等地抗日战争。

在鲁南战役中，大姚同乡五百壮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冲锋杀敌，义无反顾，很多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整个战役共有四百二十二名大姚同乡为国捐躯，在《忠勇将士英名录》^②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抗战胜利后，在大姚县城的正义公园建立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当时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李一平^③为纪念碑撰写了碑文。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的烟云并没有淹没他们的功绩，今天，更加光彩夺目了。

抗日英烈，永垂不朽！

注：①杨洪元，原名杨中鼎，亦用过杨军等名。幼时当过樵夫，后投军，在国民党部队兼任班、排、连、营、团、师长职务，后直至少将副军长。一九四九年在昆明参加云南和平起义，任省军区高参。一九五二年被错杀，死时五十九岁。

一九八二年，中共大姚县委为其落实政策，恢复了起义人员政治身份，给遗属予抚恤。

②《忠勇将士英名录》指《中华民国忠勇将士英名录》，上面对台儿庄抗日烈士有详细记录。

③李一平，大姚县人，现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

从军抗日琐记

李毓森供稿 董晓焜整理

我于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云南陆军测量学校，所学专业系地形测绘，被分配在云南陆地测量局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件”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全民舆论的促使下，遂发出抗日动员令，积极编组军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时隔不久，六十军很快组织就绪。当时，滇黔绥靖公署命令测量局征调两名测量员参军，听得这消息，我认为这是实现报效祖国好时机，便毅然写了投军从戎的志愿书，随即得到批准到五华山报到，并分配我在第六十军司令部参谋处工作。交给我的任务是三条：一是保管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军用地形图；二是绘制各时期团以上编制番号及作战的敌我态势图；三是绘制行军路线图；十月七日，在巫家坝召开六十军全军校阅誓师大会。绥靖公署组织各机关、团体、各界人士举行“欢送滇军出征抗日大会”，会后，并设酒宴招待各级军官。六十军的一八二师、五四〇旅为先遣部队，于十月十二日出发，五三九旅和师直属部队于十三日出发，一八三师亦相继出发，一八四师殿后，途经曲靖、贵阳、常德等地，行程六十余天，先后于十二月九日至十五日到达长沙。

在长沙稍事休整，又奉命编入武汉卫戍总部，归总司令陈诚指挥。全军遂开南昌，转南寻铁路从九江到武汉驻防，军部参谋长赵锦雯命我绘制出《六十军编制番号和各部队首长名系表》。同时命我前往武昌领回武汉卫戍区军用地图一式二十八份，分送军长、参谋长、参谋处及三个师、团各一份。一九三八年春节过后，接国防部训令称：六十军速调平汉路孝感一线整训。起行时，又接卫戍总部通知：“全军整队经武昌、汉口两市主要街道行军”。这时，又从云南开来三个补充团，军威雄壮，从装备上又加以充实，并增设了工兵、辎重、通信等直属部队和后方医院。这样，六十军遂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抗日战斗部队。我奉命绘出《全军驻防路线示意图》。

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鲁南会战。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夜，参谋处作战科李科长通知我，刚接军部密电，本军改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迅速调鲁南渡过运河前往台儿庄东南地区，参加保卫徐州。因战略突变尚无徐州地区军用地图。稍停一会，他又补充说：“赵锦雯参谋长授意，务于十八日拂晓，带上军部急文奔赴汉口军令部办事处领取江苏、山东交界处和徐州地区军用地图一式三十份，限定十九日拂晓带回。此行若有延误，依军法论处。”听后顿觉紧张，但军令如山，我抱着沉重的心情，然想到作战科李科长是我测校的五期同学求他帮助，他一口应允说：“我用急电告知武汉我军办事处帮你取图找车。”

四月十八日凌晨，我搭车赶到汉口，空袭警报呜呜响，大街小巷严禁通行，我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徒步闯岗，便以手

中的“特急公文袋”说服岗警，予以放行。终于找到了军令部汉口办事处，交了呈文，座等批条领图，拿到批条后，我又赶到六十军驻汉口办事处。办事处因事前接到参谋处急电，见我一到来，就派人陪同我过江到武昌军用地库领取所需的军用地图数百张，并协助我整箱搬上火车。随即星夜兼程，于十九日拂晓赶回孝感车站。军部人员已在车站等候，见我护图归来，真是喜出望外，七手八脚把地图搬上车箱，火车立即开动。在车箱里，李科长又命令我把地图按套配分成三十份，除留下五份外，下车后把二十五份面交上尉参谋，参谋再分发三个师部。由于任务紧急，连续两昼夜，仅仅只是在敌机空袭之中下车隐蔽时，才得到片刻的休息，吃饭是在车箱里以干粮充饥。

《敌我态势图》是根据第五战区总司令部提供的情报绘制的。情报内容是：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日寇精锐部队矶谷师团攻占滕县后，顺势攻下贛城、枣庄、峄县直驱台儿庄。板垣征四郎师团攻占蒙阴后，西下直驱临沂，会攻徐州。但台儿庄方面日寇被友军孙连仲、汤恩伯等部阻击，临沂方面被张自忠、庞炳勋等部阻击，两路敌寇伤亡惨重，乃退峄县山区，临沂以北蒙山以南等地固守待援。四月中旬，日寇纠集东面的矶谷第十师团，西面的板垣第五师团以及刘桂堂伪军再次反扑，妄图南下寻隙切断陇海路直攻徐州。我军一线即布置在蒲汪、辛庄、陈瓦房、耿庄、邢家楼、五圣堂、陶沟桥等地。我分别在我军阵地地图上绘出蓝箭头，敌军占领阵地地图上绘出红箭头，当时为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标箭头的着色相反，这就是《敌我态势图》并呈报军部以命令下达三个师部。

其实，军情万变，第一张《敌我态势图》，刚绘就瞬息之间，又作绘第二张，第三张。因为第一张《态势图》发出之后，又接情报称：友军被绝对优势的日寇猛攻下，已于四月二十日前撤退。汤恩伯军团也已撤退，于学忠军团已溃退陶沟桥；孙连仲军团也退至台儿庄东侧地带。这时，六十军正面已失去友军的呼应了。四月二十一日，李宗仁对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说：“你们奉命集结部队，控制上述地区是前几天定的，经过这几天的变化，恐怕已经是火线地带了，要注意。”张冲考虑了这一情况，当机立断。遂命一八四师的两个团速渡板桥埠运河北岸，连夜挖工事，隐蔽待战，以便策应，并亲临驻地各处巡视，掌握情况。四月二十二日拂晓，其所属一〇八一团在耿庄及其以南的高家楼一带与敌激战整日，团长潘朔端负重伤，副团长黄元龙阵亡，官兵伤亡甚众。驻防陈瓦房的二营伤亡殆尽，五四二旅旅长陈钟书也捐躯于战场，当晚，全师只好被迫南撤。

这些在战争运动中经常变化着的情况，我都一一及时绘制出《态势图》供军长指挥战斗参考。

军长卢汉，他在每一战役之前，都要听取并采纳幕僚们的合理意见，以统筹全局，不盲从上级决定，例如在选择军部驻地上，经过反复比较之后，才择其最佳地带为军部驻地。初住黄家楼，次住赵家楼，后住余家凹，均选择适当，确保了军部的安全。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十六日，我奉命随侍前进指挥所，多少个日日夜夜，随时绘制提供军事地图，战情几乎是天天在变化，地图也得天天绘制。根据侦察认为：禹王山是台儿庄的制高点，也是唯一可以凭据固守的战略要地。而大运河距离禹王山只有四百米左右，若敌人占领了禹王

山，那么，六十军即将腹背受敌，只有被敌歼灭一途，徐州门户洞开，敌人就可直驱徐州。军部急令一八三师、一八二师联防台儿庄、李家坪等地，由于两师伤亡较大，累出险情。四月二十七日，卢汉亲令一八四师主守禹王山，师长张冲与其所属的旅、团长都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将师指挥所设在阵地最前沿山南半坡，并亲身住守。战况不断变化，我须在战况图上标上符号，但靠标符号又往往说明不了情况，又只好重新绘图，以反映这一段时间的激烈战斗场面：一八四师官兵，在坚守阵地之中，一次又一次地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消灭了日寇大批有生力量。尽管我方伤亡亦很大，但始终坚守在阵地上。

五月十五日深夜，接第五战区总司令部来电称：“六十军另有任务，禹王山一带阵地交第四十师王文彦接防”。根据电令，六十军所部随即转移：十六日二十二点，一八二师先撤，一八三师继之，一八四师殿后，以掩护各师于十七日深夜撤完。十八日拂晓，各师进驻贾汪，军部驻余家凹，全军进行整编，以迎接新的战斗。

我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军用地图和我亲手绘制的战况图，并及时提供军部指挥作战使用，在抗日战争中尽了我一份责任，至今记忆难忘。